

全球民間社會力：台灣NGOs與國際社會的改革

■蕭新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台灣的民間社會力勢必將先自我改進、轉化和提升，既要在關懷、組織上本土化，也要在目標訴求和跨國聯盟上區域化和全球化。而這正是台灣民間社會力在跨世紀之交，迎向千禧年的最大挑戰。

迎接千禧年的第一道曙光，一睹下一個世紀的新態勢，在接近世紀末的今天應是很多人的想法。

但要預測下一個千年的第一個百年，恐非社會學者的能力所及和專業所長，但眺望下個百年的頭二十五年，也就是2025年，既合乎當下大多數人的心願和生命極限，也適合做為社會學者實證精神的訓練。

要遙望下一個二十五年的世界，就得先回首過去這二十五年的人，為某種訴求目標的達成而發揮的集體力量和組織力，而它對既有國家作為和相關制度及秩序的影響和衝擊並不限於政治範疇。雖然政治衝擊往往是最明顯和最可察覺的效果，就這樣的理解來看社會力表現得最具體的形式莫過於社會運動，而它所代表的也無疑就是民間社會的公共領域影響力。換句話說，民間社會要想對國家有任何組織化和持續的影響力，就得靠社會運動及其所展現的社會力。

那麼，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裡，全球各地的民間社會運動力曾展現過什麼樣的集

體影響呢？又曾改變了二十世紀末人類社會的舊有秩序嗎？我認為應該要以「新社會運動的崛起」和「第三波民主的浪潮」為最有代表性。

新社會運動之為「新」，在於這些展現民間動員力量的目的，不是為爭取傳統舊有的勞工階級利益，而是更廣闊地意圖改變既有的社會經濟結構、秩序和價值；進而建構新的結構、秩序和價值。這些起源於西歐、北美到東亞、拉丁美洲的新社會運動包括有環境生態運動（包括反核）、人權運動、和平運動、女性運動與第三世界團結運動、都市違建住民運動、對立文化運動、原住民運動以及種種反歧視的少數群體運動（如同性戀平權運動）等。從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開始，這些社會運動大半是由以社會文化專業人士為主的「新中產階級」（簡稱新階級）帶頭，這種不同於勞工運動的行動形式，支持者和參與者的民間動員，在過去二十多年裡，為世紀末的人類社會創造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論述、新價值和新認同，如性別平權、環境典範綠色論述，另類性偏好、都

市住民參與等，而且這些新價值還飄洋過海，在全球許多角落為新興社會風氣，形成跨世紀下一波全球化的特有內涵之一。而將上述這些新論述集結化和組織化，向下推展更廣大民眾，向上影響到更多的政府決策者的，就是分散全球各國的「非政府組織」（NGOs）。

第三波民主浪潮席捲全球

「第三波民主化」一辭是由韓亨頓（Huntington）所創造，指的就是繼1828～1926年的第一波民主化，1943～1962年的第二波，而在1975年以來在全球不同國家所發生的第三波民主浪潮。的確，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裡，歐洲、亞洲、拉丁美洲有三十個國家都經歷了政權轉型，從威權轉變為民主，也讓世人活生生地在世紀末目睹了自由化、民主過渡和轉型、民主鞏固這三個階段的展現和成就。民主化當然是全球人類社會的大事，而它背後的一股動力也是來自民間社會的動員，它可能經由中產階級所施展的社會壓力或是勞工的抗爭，再與反對黨的聯盟，從而改造了威權政體。經驗證實，民間社會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催生者之一，將也是第三波民主能否長長久久鞏固不衰的維護者。

在上述這兩個本世紀末期二十五年所發生的社會變遷大脈絡裡，民間社會力都是不可輕忽的要角。透過各類型社會運動和各種草根的NGOs，民間社會的新（中產）階級在世紀末發揮了前所未有的社會文化影響力，挑戰舊的資本主義成長價值及物質主義而揭櫫新的環境價值與「後物質主義」，也質疑長久成為霸權思想的男性沙文主義和主流族群主宰理念，而高舉女性平權主義和原住民文化自主意識。這

些在過去二十五年裡逐漸成形的論述也已經從「非主流」和「異端」的邊陲地位，提升成足以與主流並駕齊驅和分庭抗禮的「準主流」架式。而且它更超越國界，在國際和全球場域組成跨國的運動聯盟。

趨向同質化的國際社會改革

新社會運動雖是著眼於文化價值的重塑，但它對於現實政治也發揮了改造的衝擊。新社會運動雖不直接挑戰和改變既存威權體制，但是新社會運動所訴求的新文化價值和藉著運動組織所發生的集體壓力，卻足以慢慢的鬆動了一些權威政體對民間社會各領域的有形和無形控制。因此，新社會運動雖主要是從西歐民主的國家社會裡孕育和發展出來，但它卻也經由全球化的知識和媒體溝通管道傳入一些在西歐之外的權威國家，並由在地的知識份子和新中產階級將之本土化和落實，這也是為什麼新社會運動對非西歐的權威國家社會，能產生「第三波民主化」效應的原因。

綜合觀察上述這兩個大變遷脈絡的形成、基礎、擴散、互動和影響，不難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在千禧年前的過去二十五年裡，社會力已經個別或串聯地展現了它對世紀末全球政治、社會和文化領域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不論是新社會運動或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所以能夠產生超越對單一國家社會，而且有跨國性的衝擊力，並且構成交互關係和持續擴展的網絡，即得助於另一個跨世紀的大轉變—全球化。

單是就「全球化」這個概念的流行來說，就是本世紀末的跨國文化大事。所謂全球化現象，指的是逐漸以「全球」作為

一個共屬、共爭和共享社區的經濟、科技趨勢和文化的溝通潮流。用吉登斯 (Giddens) 的話來說，全球化是那些不受各種距離 (如民族國家、宗教、區域和大洲) 所限制和約束的普遍化行為和生活方式。貝克 (Beck) 更具體地將二十世紀末披靡的全球化區分為經濟、生產、資訊、生態、文化和民間社會等六個面向。雖說其中的經濟和生產的全球化或可溯及四世紀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成形，但其他四面向的全球化現象能真正被多數當代人類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得到，則不能不說始自1980年代，羅伯森 (Robertson) 稱之為「全球的同質化」，不過他也指出全球化事實上即是多個不同地方文化的匯集、互動和激盪，以及重新界定內涵的過程，這也是為什麼他主張乾脆用「全球本土化」 (glocalization) 來取代文化全球化。

全球本土化下的NGOs社會力

換言之，全球本土化本身即包含「異中求同」 (全球化) 和「同中求異」 (本土化) 這兩個具體而微的轉變脈絡，也由於這兩個脈絡的有效運作，新社會運動才有可能從西歐新中產階級的文化覺醒和自我動員，擴散到其他的地方，而同時以全球趨同的目標和具地方特色的訴求和作法在所謂的跨國社會空間裡開展而形成跨世紀民間社會的全球化。同樣的，也因為有資訊、文化和民間社會的全球地方化，第三波的民主才可能會到三大洲的三十個國家掀起民主浪潮，讓民主的普同目標和價值種子能在那麼多的威權國度裏同時成長茁壯。

新社會運動，第三波民主和全球地方化

在這三大洲同時出現在本世紀最後二十五年裡的全球社會文化轉型軌跡和趨勢，對千禧年後頭二十五年的全球社會力會產生什麼樣變與不變的新動向？

我對未來全球社會力新動向的預測，基本上是認為過去二十多年來民間社會和它的公共領域已經展現深刻影響力和動員模式，也將會持續到千禧年後的二十多年。具體地說，我們將可以繼續目睹下面這些全球社會力的動向：

讓非主流的成為主流

一、在跨世紀之交已經蔚為全球化的新價值和新論述，如性別平權，原住民文化尊嚴，環境主義永續發展和多元文化主義，將很可能在千禧年後被進一步的制度化，或再轉進成為下一世紀人類繼續追求的文化運動主流。亦即我們將觀察到本世紀興起的非主流文化價值將在下世紀頭二十五年或被接納和制度化，而展現在各國的法律、社會、經濟、文化制度的主流之內，或是仍然需要透過新社會運動的形式，再做將非主流主流化的努力。

二、在千禧年後，比較有可能被主流化的當前非主流價值是環境生態的論述和永續發展的理念，這是因為全球性的環境破壞和生態危機在下個世紀勢必將成為全球民間社會公共領域最優關懷的問題，而「大地反撲」的全球焦慮也將使得環境論述擠到性別論述和少數民族文化論述之前。

三、在下世紀的頭二十五年，全球民間社會也將必須面對為一些在本世紀末期出現的跨國界、全球化問題，以組織的集體力量去設法減輕或解決。這些問題包括環境、愛滋病、移民和難民、貧窮、族種歧視和洗劫。換言之，跨國界民間社會力的

合作和聯盟，將必然成為新的動向，這與過去新社會運動已形成的全球化影響比較，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下世紀的全球社會力的串聯，將更有形、更組織化。

多目標·多策略·多國化

四、「全球民間社會」(global civil society)將在下一世紀形成，這是由跨國界的現存多國民間組織網路所構成，或是隨著新生課題而再組全新的多邊國際社會力組織，其主旨就是在建立「全球的團結」和「地球公民」的體認。此種新生的跨國民間社會架構和場域，有別於國際政府組織和國際企業組織，可謂是國際或全球的第三部門。此一現象被Salamon稱為「結社的革命」。

五、形成中的全球民間社會，在本質上將是「多目標」的組織，也將採取「多策略」動員各個全球的地方民間社會力，以追求「多國化」的運動訴求。這應該就是Beck所指稱的民間社會全球化的最具體表現。我們也將看到這種新生的全球民間社會力與傳統的國際政治力和國際經濟力產生更密切、更具制衡作用的對話和協商。這也就是說，千禧年後將出現全球社會力、政治力和經濟力相互激盪，重新調整彼此權力關係的新態勢。

六、全球民間社會力在千禧年後，也應防範第三波全球民主化的地方逆流和威權復辟。二十五年的新生民主轉型和鞏固經驗，雖為全球社會帶來「民主文化」的跨國實驗和實踐，也使得各國民間社會持續要擔負維護民主鞏固的永續。鑑於前兩波的民主化都曾不幸遭遇反民主的逆流，民間社會在下個世紀頭二十五年也的確要時時有心地防堵威權的復辟，這不僅要靠各國社會力的警覺，也有賴於跨國的全球社

會力的積極預防。

全球地方化力量之制衡與重塑

七、全球化民間社會力也將在下一個世紀開始反省這一個世紀末所形成的全球化，針對經濟、生產、資訊、生態、文化和民間社會等六大面向的全球化對不同區域、地方和國度的衝擊進行評估和反思。很有可能的一種新動向是在這六大全球地方化力量當中，出現某種內在的相互制衡作用，並透過各自的機制(帶原者、承載者和媒介者)，進行相互修正和重塑。譬如說，生態全球化和民間社會全球化的機制就很可能會對經濟、生產、資訊和文化全球化的效應加以批判挑戰和制衡。這種反思不但會發生在不同的全球地方層級，也會出現在全球的領域，這種過程或許可暫時稱之為「民間社會對全球化的全球制衡」。

最後，我們也將目睹台灣在千禧年後的全球社會力動向新軌跡中，繼續貼近上述七個面向的全球動向。既然台灣的民間社會力在過去的二十五年裡，表現得可圈可點，在號召新社會運動和推動第三波民主化亦均未缺席，相信在未來的二十五年，台灣的民間社會也將繼續與全球化社會力同步發展，積極投入對整個全球和國際共同課題的關切和發言。

具體而言，台灣的民間社會力勢必將先自我改造、轉化和提升，既要在關懷組織上本土化，也要在目標訴求上和跨國聯盟上區域化和全球化。而這點正是台灣民間社會力在跨世紀之交，迎向千禧年時的最大挑戰。同時，一如其他在本世紀末才初嚐民主的國家社會，台灣民間社會力也必須在千禧年之後，不但要繼續鞏固民主體制、淨化民主品質，更要謹防威權遺留舊

的勢力，假借民主的面具或以庸俗化的民主身段，進行反民主的復辟。

台灣新經驗的考驗

近十多年來，我也一直在密切注意台灣的民間社會力量、政權轉移和政治民主化的關係。從觀察和分析二十種民間社會運動的興起、動員、和對政府的影響，我見證到民間社會力的確是台灣民主化的重要催生者，它不但促使政府對民間的要求和訴求做合理而有效的回應，也提供政治反對勢力進一步改變政權的可能契機。政權轉變不是民間社會運動的目的，但它卻可能與反對黨以各種方式攜手合作，採取同一陣線，而最終以政黨和平轉移為收場。政黨和平轉移政權當然是任何反對黨的終極目標，反對黨一旦搖身成為執政黨之後，就同樣會面臨民間社會力和其他在野反對黨的挑戰。

今天的民進黨政權就是這樣的處境。換言之，新政府從今以後就得面對來自當年許多戰友嚴苛的要求。

據我瞭解，包括環保、婦女、人權和福利等團體在內的幾股民間社會力量，也都在對新政府「聽其言，觀其行」，這種觀望的期限大概是半年。也就是到今年底，民間社會運動組織還會以老戰友的同情立場給新政府對相關改革議題做出令民間改革運動團體滿意的政策反應，譬如說，若到時候民進黨新政府的核四、七輕或年金政策有違當年與民間社會運動的承諾，那麼，民間社會力將會不客氣地以嚴苛的指責和批判態度來對付新政府，就像他們過去對付國民黨政府一樣。

二十年來的民間社會和NGOs與政府關係因民進黨取代國民黨執政，而正好走完

一個循環。對我來說，我也正好可以用新的角度來繼續分析新政府與民間社會將可能展開的「新關係」。

日前，我在哈佛大學對北美台灣研究學會2000年年會所做的專題演講中，也提到這個課題。我認為這將是今後台灣研究值得關注的一個新興研究重點。

除了這個課題之外，我也認為政治民主化完全達成之後，台灣的民間社會和所有的NGOs都應該再上一層樓，從完成本土的改革之後，進而投入參與國際民間社會的改革運動。這跨越國界的全球民間社會力，換另一種說法，就是以跨國的改革網絡形式出現，在這種跨國的民間社會網絡中，各國的個別民間社會團體將投入各種不同的全球改革議題和運動，如環境、婦女、人權、和平、少數民族世界秩序和發展等，並採取跨國界的聯合陣線，一齊對世界上的不同國家施壓，以期產生跨越國界的政治效果，而使上述這些領域中的改革目標得以實現。

在這種全球民間社會改革的跨國策略和行動中，在不同國家裡的非政府組織(NGOs)將彼此會共同分享和傳遞重要的資訊，會用象徵和符號、故事和行動讓改革目標能讓全球更多民眾了解，透過集體壓力可以協助弱勢團體對相關的政府、企業，或國際組織產生影響力；當然也會利用全球的影響網絡，說服或迫使某特定政府和其他權力對象改變其原有的立場和政策。

台灣的民間社會力量，應該有能力從本土提升和擴大其影響到全球，好讓台灣的能見度和知名度能再現國際。至於要怎麼做才能達到這種全球化的新目的，也正是眼前台灣民間組織的另一挑戰。◎